

专业规范、治理情境与社会工作 理论悬浮的形成机制

徐选国 陈雪

【摘要】作为社会治理的重要力量,社会工作被希冀在治理场域中充分发挥专业效能,然而,在专业规范的要求下却出现理论悬浮于实践的反常现象。现有的许多讨论忽略了来自西方情境下的专业规范与本土治理情境的适应性及其张力机制,因而不能完全解释我国社会工作实践中的理论悬浮现象。对K市困境儿童社会工作实践进行的考察发现,理论对实践的单向建构、理论在实践中沦为书写工具,以及理论的碎片化组合运用,构成我国社会工作服务实践中理论与实践互动的现实图景。深入地看,社会工作理论悬浮现象是以西方知识体系为中心的专业规范与本土治理情境之间的张力形塑而成,二者冲突下形成的形式自证、实践先行与专业妥协是导致理论悬浮的内在机理。增强社会工作文化自觉、理论自觉、实践自觉和专业自觉,促进基于我国本土实践情境的社会工作知识生产与自主知识体系建构是改变这一现象的关键性行动。

【关键词】理论悬浮;专业规范;治理情境;社会工作;形成机制

【作者简介】徐选国,华东理工大学社会与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陈雪,上海现代公益组织研究与评估中心研究员。

【原文出处】《社会科学》(沪),2024.4.154~168

【基金项目】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中国特色社会工作的主体自觉与自主知识体系建构研究”(项目编号:23BSH013)、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基层治理中社会工作站的嵌合机制及优化路径研究”(项目编号:23CSH074)的阶段性成果。

一、问题的提出

在中国社会工作专业教育恢复重建三十多年的时间里,专业化建设始终是核心内容之一。为促进我国社会工作的专业化发展和理论建设,政府、学界及实务界从不同角度做出了积极努力。首先,政府通过政策支持从专业项目购买、专业人才规划与职业制度设计等层面大力推进专业社会工作发展,形成政府主导逻辑下制度赋能社会工作发展的典型特征。^①其次,学界从专业教育体系建设、专业知识体系引介与本土化发展等层面做出了努力,在论述理论本土化的必要性、发展方向和路径、本土理论建构的基本框架等方面取得了积极成果。^②最后,基于对社会工作专业性的追求,实务界主要侧重于通过规

范的流程套表、督导等方式,促进实践者对相关理论的学习与使用。然而,在专业化建设进程中,我国社会工作发展仍然面临着专业特质模糊、自主性不足、专业可替代性强等问题,在实践中出现了诸如形式化“写工”“反理论”“实用专业主义”“去专业化”“悬浮的技术”“专业性悬空”“修辞—游戏关系”等现象。^③总体上,当前我国社会工作还存在理论落后于实践、原创知识不足、本土理论体系匮乏等问题。^④这些现象无不折射着我国社会工作发展进程中专业理想与现实实践之间的明显张力,引导我们不得不反思以西方专业标准为核心的专业化理论对中国情境是否恰当的问题。

在上述各个层面的努力之下,没有出现理论与

实践相互作用的理想状态,反而出现了理论悬浮于实践的现象,即理论主要成为档案或实际服务过程中“专业展演”的工具,这并非偶然。长期以来,理论与实践的脱耦在各学科发展中都是一个大问题,这本质上是由理论与实践之间的差异所决定的。在社会工作领域,国外研究早在20世纪70年代就关注到这一问题,常用“紧张、冲突”“间隔”^⑤形容理论与实践分离的现象。本文所要讨论的社会工作实践中的理论悬浮现象,正如皮拉力斯(Jennie Pilalis)所描述的——反思性思维与有计划、有目的的行动之间的距离越来越远,进而偏向单独的思维或行动范畴。^⑥笔者在K市困境儿童社会工作项目实践调研中发现相似情形,表现为实践中理论与实务行动各行其是,^⑦在现有专业规范要求之下,理论常常作为实践者书写档案(包括项目申报书、项目总结材料以及案例申报等)的工具性和规范性要素,与实践几乎没有关联;此外,实践中还表现出一种在实用主义逻辑下对不同理论采取技术组合运用的情况,即对几个不同理论中的技术和概念进行抓取和组合,却缺乏对具体理论假设及其背后的价值基石的考虑与反思。

通过对该项目实施两年来的高危个案档案进行文本分析发现,在运用心理社会治理模式进行指导的个案中,有一半档案仅呈现了该理论模式的名称,未呈现其核心观点并结合服务对象实际情况进行分析,八成实践者的实际干预过程与心理社会治理模式不相关。而在与社工实践者进一步沟通中发现,他们在专业实践中多以实践逻辑为主,尤其是以完成相应的指标为首要任务,较少考虑到运用理论指导实践并反思理论的有效性问题。此前一些研究将这一问题归因为实践者的理论水平限制和西方社会工作理论的适用问题,笔者认为这种简单的归因并没有成为解决现实中持续存在上述问题的解决之道,需要进一步深入研究和检验。基于此,本文关切的核心问题在于:在我国社会工作实践中,理论更多被作为书写工具,进而悬浮于实践的多重特征是什么?造成这种理论悬浮现象产生的内在机制为何?

二、文献回顾与分析框架

通过梳理国内外关于社会工作理论与实践分离、社会工作理论本土化的相关研究发现,既有文献

主要侧重于从理论与实践发展整体层面、社会工作知识本质、专业教育与实践的区隔、理论本土化与适用性不足等普遍化思路进行论述,并聚焦理论与实践的应然互动层面进行阐释,很少从本土具体实践情境、实然角度、微观机制层面进行展开。因此,本文基于对我国社会工作专业规范形成及特点、所处社会情境的相关研究脉络的分析,借用“过渡治理情境”概念,结合研究对象的实践情境,建构了“专业规范—治理情境”分析框架,以厘清本土实践中理论与实践的实然互动样态,并阐释社会工作理论悬浮于实践的形成与维持机制。

(一)找回治理情境:社会工作理论与实践分离现象研究及其反思

社会工作理论与实践分离是社会工作期刊中经常出现的研究主题。1969年,在布莱恩(Sheldon Brian)进行的一项调查中显示,大约一半受访者在过去一年中没有读过任何有益的、更新的研究,^⑧理论与实践的关系在现实情境中体现出明显的分离特征。这种分离说明实践者对研究中的相关理论知识利用不足,从而导致服务对象不能接受最好的服务而继续处于困境之中。^⑨国内外已有研究主要从理论与实践的区隔、专业教育的领先或滞后两个层面对这一现象展开解释。

第一,理论与实践之间本身就存在较为紧张的关系。社会工作理论强调科学性、有效性、可验证性、普遍性,而实践却有某种不确定性、模糊性特征,因此,理论与实践属性的差异本身就导致了二者之间存在难以弥合的裂缝。^⑩这背后映射着对实证主义认识论的批判反思,特别是强调以实证主义认识论为核心的科学知识生产逻辑面临着来自实践的复杂性、不确定性的挑战时,会导致实践者常常遭遇“严谨与适切”“理论高地与实践洼地”的现实悖论。^⑪学术机构与实践社区的分立进一步加大了理论与实践之间的鸿沟。^⑫从本质上讲,两种场域实际上是相互区隔的,社会工作研究者更多为了学术本身(如职称要求等)而书写,而非为了指导实践而书写,导致理论的实践效用十分有限。^⑬因此,理论场域与实践场域的区隔往往会导致理论滞后于实践或悬浮于实践。在新实用主义和后现代主义思潮的影

响下,实践智慧、生活智慧逐渐被学者们关注,有研究证明实践知识同样成为社会工作理论类型的重要组成部分,^⑪同时,越来越多学者也开始关注到社会工作实践知识的重要性,并积极倡导一种“反思为本”的社会工作理论实践。^⑫

第二,专业教育与实践的分离也导致了现实理论与现实的分离尤其是理论悬浮现象。有研究表明,教育领先于实践的情况会导致现实情境中出现理论与实践分离的现象,虽然教授在课程中为学生提供社会工作领域最新的知识,但该领域的社会工作者可能继续使用旧的信息。^⑬我国社会工作在一定时期内出现的“教育先行”发展模式导致了理论对实践的单向建构,而忽视了实践对理论的反向建构;目前“实践先行”的特征更为突出,一些教育者在课程中为学生提供旧的知识,而实践者却使用更多新的知识,导致现有理论体系难以有效指导和支持实践发展。可见,专业教育作为理论与实践联结的重要载体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然而,现阶段许多教学内容依然以西方知识体系为参考样本,其与中国社会治理情境的联结程度不够紧密,进一步制约着理论与实践的有效互动。

(二)专业规范—治理情境:实践中理论悬浮的一个解释框架

社会工作在中国恢复重建和发展的历史动因在于我国新旧体制交替背景下社会变迁对于社会工作的内在呼唤,以及本土缺乏专业社会工作的前提下对于国外先进经验进行移植学习的双重逻辑。在民政部门和教育界的共同努力下,专业社会工作在行政推动、教育先行的发展路径下得以迅速发展。纵观我国社会工作恢复重建以来三十多年的发展历程,以对西方社会工作知识体系借鉴移植为主,^⑭尽管在这个过程中学界注意到外部知识移植到本土之后不可避免地存在适应性问题,并因此提出社会工作的本土化议题,^⑮然而,被普遍忽视的是,这种本土化论述未深植于近代以来中西不平等的现代化脉络之下,导致本土化进程中对中国特色社会工作主体性关切不足,从而陷入依附先进的他者为中心主义的本土化和忽视形塑西方社会工作特定政治、社会、文化脉络的狭隘本土化泥潭之中。因而,从本土化迈向

本土自觉、本土建构,找回中国社会工作的主体性应成为中国式现代化背景下真正实现自主知识体系建构和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抉择。^⑯虽然学界已经意识到构建中国特色社会工作知识体系的重要性,但关于本土知识体系建构仍然处于对以往专业发展路径反思、理想知识体系建构等中宏观层次的呼吁,缺乏从丰富的实践中推进本土知识体系生产的相关研究。

在本土化过程中,我国对西方专业社会工作的借鉴移植体现了对以西方专业知识体系和专业标准为核心的专业规范的遵循,从专业教育进一步延伸至实践场域之中,构建了整体的“专业社会工作叙事”。从笔者所调研的K市困境儿童社会工作服务实践来看,地方政府通过采购指引和相关政策文件、专业服务格式套表,形成了一套关于专业界定、专业服务内容、专业流程以及专业实践者标准的相关专业规范,尤其从专业文本规范、专业服务流程与内容、专业实践者资质三个层面做出了严格要求。在专业文本规范上,一方面对专业社会工作进行界定,强调其立基于科学理论基础、遵循专业价值观开展精准性服务;^⑰另一方面,从社会工作专业个案、小组和社区三大方法进行区分,形成了困境儿童及家庭社会工作全套服务格式表单,涵盖专业服务流程、理论基础、服务记录等要素。^⑱在专业服务标准流程与内容上,以个案为例,其遵循西方标准化个案服务模式,强调接案—预估—计划—服务—评估—结案的专业服务流程,并要求在规定时间内完成每一项必备工作。在专业实践者资质层面,要求实践者必须具备相应专业教育背景或职业资质及实践经验,以此作为从事实务工作的身份标志和职业门槛。

从专业规范要求来看,立基于西方专业服务标准与界定,K市对困境儿童社会工作服务项目的专业实践作出了较为全面的规定,然而,需要注意的是,当这些规范性要素进入具体的治理情境时会出现什么状况抑或是否适用?这就需要进一步考虑我国社会工作所处的实际治理情境。中国社会工作的发展受其所处的治理情境影响较大,其中最大的治理情境就是社会工作的专业服务与党政主导的基层治理任务之间呈现出一体性,而缺乏清晰的边界,这就导致在中国情境下只注重专业而忽视治理将难以

为继。具体而言,中国社会工作发展的情境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中国社会工作的实践形态主要依托政府购买服务而镶嵌于层层体系之中,进而出现专业服务须服从新公共管理主义逻辑的悖论;^②二是区别于西方个体主义文化下的主动求助模式,中国社会工作者面对的“求一助”关系体现为由近及远、由亲到疏、由内而外的“差序格局”,^③与西式主动求助逻辑存在较大的文化情境差异;三是社会工作者所处的弱专业化实践情境,包括社会工作者群体本身的社会地位、薪酬水平,以及社会工作者在面对复杂治理情境中专业效能的限制。可见,社会工作实践所处的治理情境具有多维复杂面向,如果不考虑这些特定情境而盲目追求所谓的专业规范,就会出现对既有专业规范的机械套用与难以体现专业实践效能的悖论现象。

如上所述,现有解释虽在一定程度上注意到从西方移植借用的专业知识体系与我国特定现实治理情境之间的内在张力,但试图将这种张力的解决诉诸所谓的“本土化”逻辑来应对仍然难以从本质上扭转这个局面。因此,理解社会工作发展过程中所出现的现象不能脱离其在中国发展的内在逻辑及其实践所处的社会情境,笔者结合K市困境儿童社会工作服务实践,建构出专业规范—治理情境的二维分析框架,从而解释以西方知识移植为主的发展逻辑下所形成的专业规范在进入本土治理情境后出现理论悬浮于实践的深层机理。具体而言,笔者建构了如下三个核心命题,作为解释社会工作实践中理论悬浮的生成机制。

命题1:当兼具政治意涵和专业引导意涵的专业文本规范进入特定治理情境时,其在效率优先、风险管理、多方交代等逻辑下更容易成为具有政治意涵的形式自证工具,这为社会工作实践中的理论悬浮产生提供了客观前提条件。

命题2:当抽离于具体服务对象日常生活场景/实践的(西方)标准化专业服务规范进入我国社会福利与治理场景时,其面临着来自本土文化、求一助关系、复杂环境等方面的一系列挑战,社会工作实践者会选择实践先行或概念抽取、组合策略而忽略真正的理论探索与反思,这种对理论的主动抛弃是实践

中产生理论悬浮的根本原因。

命题3:接受过专业教育或获得职业资格的实践者难以具备现实情境所需要的相应实践能力,同时,在本土实践先行、专业滞后以及实践缺场的理论套用共同形塑下,实践者处于弱专业化实践处境,他们选择了将专业(理论)高高悬置的专业妥协策略,这是理论悬浮产生的主观内在原因。

近年来,K市在全市范围内推动困境儿童社会工作服务项目,初步构建了社会工作参与困境儿童服务的制度体系和实践体系。在调研过程中笔者发现,理论在社会工作服务实践中常常被视作规定性要素,而理论本身能否真正指导实践、促进实践却很少被考量。基于此,下文将以K市“点亮希望,伴你成长”困境儿童社会工作服务项目实践中的理论运用为研究对象,探讨社会工作实践中理论悬浮的内在生成机理。^④具体而言,借助质性研究方法,我们对全市12个困境儿童社会工作服务项目开展了持续半年的参与式观察,通过观察法、文本分析法搜集了大量困境儿童社会工作实践中相关理论应用状况的过程性资料,并通过访谈法对K市困境儿童社会工作实践者、第三方评估人员、督导平台项目负责人、不同机构内部项目主管等14名成员开展了深度访谈。在资料分析方面,遵循资料三角检验原则,以服务文本、访谈与观察记录等相互印证,并根据研究问题采取类属分析对研究资料进行分析。

三、理想认知与实践反叛:困境儿童社会工作实践中的理论悬浮

社会工作理论作为K市专业规范要素之一是实践者必须考虑的方面,然而在具体实践中,实践者多将理论作为书写文本档案的工具,并形成不同服务领域内“社工常用理论20/30/100种”等工具化文档,导致理论多被置于档案之中,脱离真实的社会工作实践;同时,在专业规范要求下,将理论进行概念化拆解、碎片化或工具化组合应用,是目前理论应用的常态。概而言之,实践者基于观念上的认识形成了理论指导实践、实践反哺理论的理想认知,然而在现实中却抛弃了这一理想逻辑,出现将理论搁置于档案、理论脱嵌于生活、碎片化拆解应用的多重样态。

(一)名实分离:实践者对理论与实践关系的理想与现实认知

学界已有不少关于理论与实践关系的讨论,这些讨论背后涉及不同认识论与本体论假设。了解一线实践者对理论与实践关系的认知叙事是分析其理论应用现状的基础。我们围绕“您如何看待理论与实践的关系”这一问题与实践者展开了讨论,通过分析访谈资料发现,受访者普遍认为理论与实践是一种“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科学环”的关系。

实践和理论的关系在于,一方面,理论指导实践,这个是毫无疑问的;另一方面,实践也能够推动理论的发展。(ZY 社工机构项目主管 GH20221124)

这种双向互动是对理论与实践关系的理想建构,无论学界还是实践者都有此期待。然而,现实中则更多表现为理论对实践的单向建构特征,即实践者多侧重于理论如何指导实践,而忽略了实践对理论的建构维度。在谈及理论对实践的作用时,90%受访者表示理论能够指导、指引、引领实践,是实践的重要基础与支撑;30%受访者表示理论能够提供技巧和方法。此外,2位受访者表示,理论能够影响实践者的基础认知与价值观,1位受访者表示理论让社会工作服务“可能更专业”。

理论给了我一个解释力,就是我能解释服务对象行为的来源,解释我为什么需要这样做。(ZY 社工机构项目主管 SYT20230330)

然而,在谈及实践具体如何作用于理论时,实践者则难以表达出来,仅有3位受访者给出回答,其中2位受访者表示实践能够补充和完善理论、推演和发展新理论;另外1位受访者表示实践是基于理论指导的实践,而无实践支撑的理论则是空泛的。

我觉得在实践过程中,实践也能够推动理论的发展,虽然我们还没达到那个高度,但这个目标是会出现的,甚至我觉得实践其实能够从某种程度上演化出一些新的理论。(ZY 社工机构项目主管 GH20221124)

从实践者对理论与实践相互作用的叙事来看,实践者所表述的理论与实践的双向互动是一种实证主义认识论的理想形态,但实际上理论与实践的互动更多出现“理论高于实践”的单向建构路径。实证

主义认识论的知识等级化特征深刻形塑着实践者的认知,理论指导实践、实践反作用于理论成为实践者的惯性认知。在这种认知逻辑之下,理论与实践之间难以形成一种开放、批判的互动状态,实践者的技术运用角色在专业教育中得到强化,而理论检验反思角色则在实践的困境中被逐渐遗忘。在实证主义的知识霸权下,实践者正成为专业的技术找寻者,其批判、反思能力在权威关系之下进一步受阻,理论与实践的区隔问题则常被表述为理论运用问题,实践者也将这一问题主要归结为自身理论积累、理论运用与转化能力不足。双向互动的理想认知与单向建构的现实悖论注定了实践者的“反叛性行动”。

(二)理论作为实践者的书写工具而存在

在K市现有专业规范下,理论作为套表中的专业元素之一是实践者必须考虑的内容。实践者表示,在具体服务实践中较少考虑理论的实际应用问题,只有在书写服务档案时才会考虑理论选择问题。普遍的情形是实践者基于理论熟悉度或督导意见将一个或几个理论的简介填入表格中的理论板块位置,作为“必不可少的”支撑材料,而较少将理论与实践对象人群特征、问题与需求、服务内容设计依据,以及服务成效考量等结合起来,进而出现理论脱嵌于服务对象生活实践的情形。当理论作为一种书写工具时,其与实践的互动呈现出时空分离、主体分离的特征,成为一种“仪式性的存在”。

理论与实践时空分离是在专业规范要求下出现的实践先行、倒推理论的现象。在现有规范之下,实践者需要按照专业服务流程完成服务表单,并及时提交给督导审阅指导。虽然对于表单提交有具体规定,例如服务计划表的填写说明中规定“此表需于督导/主任批准开案后7个工作日内填写呈交;个案目标需与案主或其监护人协商拟定”,然而具体实践操作时并未严格遵循上述时间规定进行档案管理,许多实践者临近评估时才匆忙补档案。这种情形再现了社会工作实践中理论缺场、理论主要作为书写工具的现象。通过对所有访谈资料进行编码发现,其中有80%的受访者谈到实践过程中出现实践先行、倒推理论的现象。

以我自己做的一个个案为例,我最终写案例报

告时用的理论模式是任务中心模式,其实我们在具体介入的时候完全不知道该用什么理论,如何运用任务中心模式,我们可能就是把那个理论放在那里。(JSYL机构项目主管 HSY20230416)

这个例子在现实中广泛存在,即理论更多成为实践后倒推的专业材料依据,并未成为实践中服务设计、服务实施和服务成效反思的依据,因而难以为实践助力。而理论与实践的主体分离是指在现实情境中理论书写者与具体实践者分离的现象,这种情况一般出现在非专业出身的实践团队之中。对于非专业出身的实践者而言,他们往往缺乏对于所谓社会工作理论与介入模式的概念,因此,一般遵循实践为先的行动路径,当涉及专业理论与模式的应用时则依赖于团队中专业出身的实践者或者督导。针对这种现象,一位受访项目主管谈道:

他们(团队中非专业科班的同事)没有这个(理论的)概念。做了一段时间,他们已经知道服务对象的问题和需求是什么,能写出来问题和需求分析,还有目标计划。但是他们不知道用什么理论。最后我去跟他们说,或者是机构督导给他们说用什么理论。(JSYL社工机构项目主管 HSY20230416)

分析上述两种理论与实践分离的现象我们可以发现,理论作为专业套表中的规范要素之一在实践中演化为一种专业自证的书写工具,呈现出形式化、工具化特征,理论只是为专业实践者提供程序、流程和要素齐全的合法性、合理性。

如果是我,我会把它(理论)放在那里,因为这是必需的。但是我不一定会用,也不一定用得上,因为实践经常比理论呈现的框架更为复杂。(TS社工机构项目主管 GQL20230419)

理论的书写工具式应用现象较为普遍地出现于其他类似的项目实践之中,^⑤折射了我国社会工作发展的特殊逻辑,即专业合法性要求社会工作必须具有专业理论的“加持”,然而实践的复杂情境则对这些专业理论存在着拒斥。

(三)实践者对技术的拆解、组合与碎片化运用

K市民政局对专业规范的要求以及实践对理论的诉求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实践者对理论的尝试性运用,实践者对于理论的态度从原先敬而远之、束之

高阁逐渐转向“挣扎靠近”,出现了基于工具理性逻辑所进行的理论或概念碎片化组合,而将理论的系统性、关键性以及本土性要素加以悬置,这是理论悬浮的另一种表现形式。

在中国社会工作发展的治理逻辑下,实用专业主义成为本土社会工作发展专业能力的重要倾向,理论中的程序性技巧成为实践者青睐的对象。^⑥在实践中,实践者可以根据完整的理论和指引性的“介入流程”指导实践工作,^⑦对理论的运用表现出一种较强的工具理性倾向。例如,在K市困境儿童社会工作服务项目督导平台对接会议上,实践者向督导表示自己想要的不是告诉他们“是什么”的理论,而是更多告诉他们应该“怎么做”的理论。^⑧这一倾向在本研究受访的实践者中普遍存在,多位实践者提到希望督导平台或项目主管能提供更具有可操作性、指引性的理论。^⑨然而,由于目前许多社会工作理论无法为实践者提供上述支持而被他们搁置不用,甚至理论价值遭到质疑。例如,一位大三的实习生反馈道:

现在的社会工作理论课本没什么用,我从来不看,上课也没什么用,我感觉心理学的东西人家就很厉害,所以我会自己去看一些心理学类的书籍。^⑩

在技术理性逻辑之下,理论是否能够快速、有效被运用于实践成为实践者的重要选择标准,而碎片化抓取和组合运用则成为实践者选择和运用理论的主要逻辑。通过与实践者探讨在实践中具体理论的运用过程我们发现,实践者对于理论的理解与运用停留于概念层面,缺乏对理论更加深入、全面的思考。在具体实践过程中,实践者习惯将理论的某一点、某个概念运用到实践中。例如,行为治疗的正强化技巧,寻解治疗的刻度问句、奇迹问句技巧,优势视角的优势以及抗逆力概念等,然而他们对于这些理论的渊源及其核心思想缺乏系统了解,对理论在实践过程中的连贯运用与实践后的反思同样予以忽略,出现“为了用而用”的现象。

这种技术组合与碎片化运用特点由实践者对理论的技术理性想象所形塑,但同时也受实践者理论基础薄弱及理论在本土情境中的适用情况影响,进一步限制了实践者系统学习、批判反思的能力。技

术理性在某些方面或时间段处于一种上升倾向,而现实社会情境中对效率、技术的强调强化了这一倾向。^③实践情境中这种过度技术理性的追求导致了实践者的反映意识和能力的下降,因为实践者的大部分精力被用于找寻快速有效的操作化技术,而没用在思考这些在他们看来本应由高校专家思考的东西上面。一位督导和一位主管分别谈道:

一线社工们没办法系统学习,而且我觉得现在有很多社工太过于注重技术。他们拿到一个技术,首先关注的是学这个东西的目的,就是一定要去解决一个问题,或者是一定要去干什么,否则他们也不想学,这样看起来确实是很功利、很实用主义。当马上要用才去学,而学的时候只挑理论里面能用的部分、好用的部分,他就拎出来去用。(DT 社工机构负责人兼 K 市督导平台项目负责人 ZF20230524)

话语体系(学术和实践的话语体系)是不一样的,就是福柯的真理游戏。游戏的那个缔造者根本就不在我们这个里面。(ZY 社工机构项目主管 SYT20230330)

不难看出,在技术理性取向向下,理论被实践者碎片化解解和组合运用构成其在实践中的另一种悬浮化样态,这一方面促进了理论在实践中有意无意的运用,另一方面也限制了实践者的批判反思能力,阻碍了理论对实践的真正效用,以及实践对理论的潜在作用。

四、专业规范与治理情境的张力:社会工作实践中理论悬浮的机制分析

以上三种情形是社会工作理论运用于实践中所

存在的悬浮状态,即理论在现有专业规范之下主要作为书写工具存在,并在技术理性支配下脱嵌于服务对象的日常生活实践,在不得不使用理论时出现拆解、组合与碎片化使用等现象。理论与实践分离、理论悬浮于实践背后的深层次机理是什么?笔者认为,以西方专业标准为核心的专业规范与我国本土治理情境之间的张力在实践中催生出形式自证、实践先行与专业妥协三重机制,共同导致实践者认知与实践偏差、脱嵌于生活实践、主动悬置理论的多重悬浮样态(如图 1 所示)。

(一)形式自证:复杂治理情境下专业规范的合法化呈现

1. 专业文本规范:作为专业意涵和政治意涵的存在

专业文本规范是地方政府对专业定位与专业发展要求的直接体现。K 市在项目实践中形成了一套专业文本规范,其主要表现为明确的采购指引、市级层面统一的专业格式套表。采购指引与专业格式套表内容主要呈现出以下特征。

其一,采购指引强调了社会工作的专业要素及服务的专业性与精准性。这种专业定位遵循了西方关于专业标准的定义,专业的价值观、专业理论、方法和技术成为专业的基础元素,专业教育、资格证书与服务经验成为专业的重要条件,其采购指引将项目实践的目标定位为:

根据困境儿童的生理、心理特点和成长、发展需要,以专业的价值观为指导和科学的理论为基础,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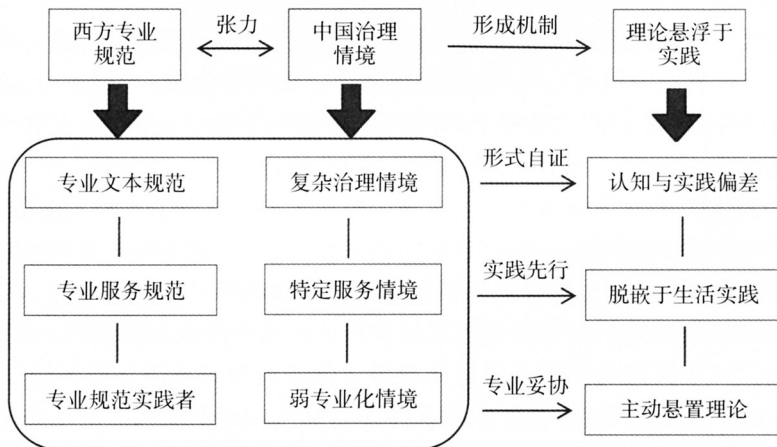


图1 社会工作理论悬浮的形成机制

用社会工作的专业方法和技巧对困境儿童开展精准性服务,以缓解困境儿童及家庭的困境和危机。^③

其二,在服务内容与专业服务流程方面遵循西方社会工作的专业服务标准。在服务内容方面主要包括运用专业个案、小组、社区工作方法为服务对象提供服务;在服务的专业流程上也主要遵循接案—预估—计划—介入—评估—结案的通用过程模式。在这一标准之下,实践者对科学理论基础、技术与方法的界定自然会以已移植到本土的一套西方理论知识体系为参照。

这种专业文本规范并非K市独有,据笔者了解,几乎所有的社会工作服务项目都有一套专业文本规范要求,差异在于部分项目并未从市级整体层面进行规定,但却在内部形成一套专业标准以应对项目评估或机构管理需要。^④那么,此类专业文本规范为何需要?除受西方新公共管理主义的问责制和绩效考核影响外,笔者发现,这种专业文本规范的存在还深植于社会工作在中国发展的特殊环境,其背后具有一定政治意涵和专业意涵。政治意涵是指社会工作作为一种专业治理工具需要以专业界定、专业流程与专业理论等元素向相关方作出“政治交代”。正如佩恩所说,社工在其日常实务的政治中使用理论,为管理人员、政治家、案主和公众等提供责效,从而获得专业合法性。^⑤而专业意涵则是指部分实践场域期望通过专业规范引领专业发展、规范专业流程。从K市相关专业规范的设计来看,主管部门对社会工作的持续发展给予了较大期望,希望通过继续教育和专业规范促进本土社会工作专业力量的发展与作用发挥。当前,社会工作诸多领域推动专业实践标准化的尝试和努力,较好地体现出专业文本规范的政治与专业双重意涵,而在自身缺乏规范化、标准化的专业基础可供参考时,不得不在教育、政策和实践等方面形成一套普遍移植西方标准的依赖路径。

2. 形式自证:风险管理与成效导向情境下专业意涵的弱化

社会工作作为社会治理创新的重要力量,在社会治理创新语境下得以迅速发展,然而,社会工作目前却处于一种“过渡治理情境”中;在这种情境中,政府对社会工作采取了鼓励发展和专业约束的双重悖

论逻辑,其主要坚持权力维持下的问题解决导向。^⑥因而在这种治理情境之下,社会工作服务项目实践需要同时面对风险管理与成效问责。

其一,在向上交代的压力型体制之下,作为市级项目的主管局在全市层面推开困境儿童服务项目购买,其需要向上级政府和社会作出财政和成效交代,向下关注项目实施风险与持续发展;而作为直接购买方的区镇级民政部门则需要向市级做出绩效管理 and 风险管理交代。因而,社会工作服务项目被嵌套于层层体制之中,需要根据不同层级主体需求作出差异化回应。例如,在K市L镇末期评估会议之后,社工实践者谈起区镇层面领导十分希望项目承接方能够做出项目品牌、充分发挥项目影响力,这种品牌打造也是为了获得更多政治认可的普遍现象。由是观之,在当前的项目服务实践中,社会工作实践者需要处理与多方主体的关系,同时要保持项目服务的整体成效、针对性、转接性和累加性。^⑦其中,整体成效导向、项目基础指标、服务数据则成为各方重点关注的内容。

其二,出于对治理创新的风险控制,政府采取了新公共管理主义逻辑来加强风险管理。新公共管理主义关注效率,并以“问责制”“绩效考核”作为提升效率的主要策略,这在强调痕迹记录、系统信息收集和数据指标等要素中表现出来。^⑧在K市困境儿童项目体系中,社会工作实践者需要向多方负责、多方交代,实践者将其处境调侃为“一个儿子五个爹”^⑨,即实践者在具体实践中需要面对市级主管部门、区镇层级政府采购方、第三方评估方和督导方、承接机构、服务对象以及落地村社区两委等多方主体要求。在对上负责及严格的财政审计背景下,实践者需要面对来自服务指标、规范文书、多重会议、成效产出、项目外行政协助工作等相关事项的压力。这种单一身份与多重角色期待的处境让实践者处于碎片化时空之中,实践者的服务精力与时间被消耗于繁杂的事务之中。在关于实践过程中影响理论运用的障碍因素探讨中,超过七成的受访者表示主要障碍在于“工作繁杂”^⑩“工作量大”^⑪“没有时间”探索 and 更深入地思考专业性、理论层面的事项。^⑫

因此,兼具政治意涵和专业意涵的专业规范进

入强调风险控制与整体成效的“过渡治理情境”时,理论的专业意涵被弱化,而政治意涵得以强化,理论更多成为一种专业自证的形式化工具。这种做法实则是对社会工作理论专业规范的合法化努力。“过渡治理情境”更加强调风险管理和项目整体层面的成效与影响力,新公共管理主义下的多方交代与问责则成为实践者需要面临的实际处境。项目成效更聚焦于项目整体服务逻辑、指标完成情况、项目影响力、项目品牌建设等,微观层面的理论运用及一般意义上的服务专业性在这一情境中被选择性忽视。因此,处于碎片化时空的实践者基于专业合法化坚守而选择将理论悬置于档案之上,以此作为弥补理论“有形无神”的形式化应对策略。

(二)实践先行:特定服务情境要求对理论应用的无奈悬置

自20世纪80年代末期恢复重建以来,我国专业社会工作的发展主要以专业化、职业化较为成熟的西方社会工作为蓝本,在行政推动、教育先行的发展路径下,呈现出明显的知识移植特征。^④然而,西方社会工作的诞生与发展有其特殊的时空条件,以英国社会工作发展为例,其诞生于工业革命带来的一系列社会问题所引发的道德实践之中。早期实践形态表现为中产阶级基于自身的价值需要、道德感与宗教责任感而实施的一系列济贫救困工作。从历史上来看,作为改造穷人的道德救济与道德实践,其发展表现出明显的内部矛盾性,这是由中产阶级的中间性所决定的。^⑤同时,基于早期穷人改造实践经验与以医学、心理学为主的学科理论借鉴而形成的核心知识体系具有以个人为中心的特征,即便后来强调“人在情境中”,但对于情境的关注也主要是以个人为中心的延展,而对宏观社会政治结构脉络缺乏关注。

然而,我国社会工作的发展深刻镶嵌于“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的治理体制之中,前述西方微观取向的理论体系对中国社会工作有一定借鉴性,但无法完全回应处于社会治理脉络下的实践需求。这种忽略中西社会工作发展不同时空处境及特征的单向移植过程导致专业在我国呈现出一种悬浮发展状态。当西方专业标准服

务逻辑难以契合本土专业治理服务逻辑要求,且面临着来自实践场域的不同文化挑战时,形式化运用理论以及采取实践先行而忽略理论就成为实践者的主要行动策略,这两种情形在本质上是出于西方专业理论缺乏恰适性、而本土理论匮乏的无奈选择。

1. 专业标准服务与专业治理服务:中西实践中不同服务逻辑的差异

在中西不平等知识移植过程中,现有专业规范服务遵循的是一种以个人为中心的、抽离服务对象日常生活的、自上而下的标准化专业发展逻辑,其以西方科学化实证知识为基础,强调标准化的理论模式能够普遍适用于不同的实践情境。然而,这种科学实证的主流专业知识体系本身面临着来自复杂、模糊变动实践情境的挑战,^⑥并且自上而下的专业服务逻辑遵循着一种抽离服务对象日常生活的实证主义“科学化”普遍逻辑。^⑦这种逻辑下的社会工作实践依托西方专业服务场景,服务对象基于个人较为明确的权利与义务认知主动求助于专业身份较为明确的社会工作者。因而,社会工作者与服务对象能够基于较为明确的服务需求和权利责任建立专业契约关系,并抽离其日常生活针对其问题表征进行诊断、干预。

与西方立基于明确专业身份与专业需求的自上而下标准化服务逻辑不同,中国的社会工作实践镶嵌于福利治理的行政体制之中,是一种场景化实践的专业治理服务,实践者面临着专业身份缺乏与专业需求不明确的现实处境。^⑧因此,作为福利传递的主体,社会工作者需要主动深入服务对象日常生活社区,探寻服务对象需求,^⑨并根据其所处的日常生活情境设计个性化的专业服务方案。

然而,在探寻专业社会工作发展过程中,以西方专业服务标准为参考的专业逻辑出现了。以K市专业规范服务为例,其遵循西方传统三大方法,将其规范为个案、小组和社区三大服务内容。同时,在专业规范流程的设计上也主要遵循西方专业服务逻辑,以个案为例,其遵循了接案—预估—计划—服务—评估—结案的服务流程,并要求在接案后2个工作日完成预估,7个工作日内完成计划表,同时在计划阶段需要与服务对象共同签订个案服务协议。然

而,移植于西方的一套专业服务规范难以贴合实际服务情境,当带着一套所谓专业标准进入实践场域时,笔者能感受到一种强烈的割裂感,在调研过程中我们发现,社工针对困境儿童开展的服务缺乏专业性,个案被简化为缺乏服务逻辑的频繁入户探访和面谈工作,其服务存在需求把握不精准、设计缺乏针对性等问题,同时理论的运用停留于书写层面。在与实践者深入交谈后笔者发现,现实情境中的服务不同于现成的专业规范逻辑,其面临着来自被动求助模式^⑧、个人与家庭冲突、专业权责差异的重重阻隔。

2. 实践为先:西方理论移植的本土适用限度及无奈选择

中国的专业治理服务场景对于实践者的要求不同于西方理论所要求的一套专业规范标准,盲目追求以西方知识体系为核心的所谓专业,往往会陷入狭隘的专业主义陷阱,忽略了丰富的实践智慧与多元理论空间。在专业规范服务与专业治理服务的张力之下,现实情境中出现从实践倒推理论、工具化或碎片化运用理论的现象。

其一,实践中专业关系建立、服务逻辑不同于(西方)专业标准服务的逻辑,这就导致专业标准要求下实践者只能采取形式化应对策略。例如,在专业规范要求、评估指标安排下,实践者需要在短时间内完成对服务对象的一系列预估与计划工作。然而,正如实践者所言,与服务对象关系的建立基于一次次坚持不懈的跟进,以及服务对象实实在在的改变,因而前期服务开案过程难以对服务对象问题进行全面预估,甚至难以把握服务对象的真实需求。在这种情形下,实践者只能找一个看起来合适的理论填充到档案之中,后续服务则以实践为导向而忽视理论运用。因此,当专业规范面临来自现实服务逻辑的挑战时,为了规避麻烦,实践者采取了将理论悬浮于档案之上、坚持实践为先的行动策略。有项目主管表示,如果完全按照规范化的要求开展服务,会与我们自身的文化情境和社会大众的文化心理存在矛盾:

我们在做个案的时候发现,它的通用过程模式从接案到结案整个过程下来很别扭,过程中要让服

务对象签订契约有时会吓到他们。因为文化环境不一样,中国是人情社会,遵循熟人关系逻辑,而西方国家的服务对象签订服务契约很正常,但是在我们的社会中就很难。他们(服务对象)更在意的是熟人关系、信任关系的建立,要看跟你这个人熟不熟,值不值得信赖,见了几次面,能不能感到真正的关心等。(JSYL社工机构项目主管 HSY20230416)

其二,现有移植的一套专业理论缺乏本土适用性转化与实践检验。虽然已有研究从中观和宏观层面对理论本土化进行关注,但却缺乏结合本土实践情境进行转化的努力。实践者认为,现有的理论并不能提供操作化指引,只能给予概念上的泛化支持,自己难以将理论与具体实践情境联结起来。以心理社会治疗模式为例,实践者发现,如果只是了解相应的理论介绍依然不清楚应该如何运用它,甚至表示“看不懂”,没办法跟具体实践结合起来。^⑨因此,当实践者发现现有理论难以对实践提供指导时,他们宁愿悬置理论而采取“实践先行”的策略。

(三)专业妥协:专业规范标准失效下弱情境实践者的主动遗弃

K 市民政主管部门从专业教育背景、职业资质及实践经验层面对困境儿童社会工作实践者的专业资质作出了规定。然而,基于对承接组织发展基础、不同区镇专业服务基础、项目可持续发展等多维因素的考虑,对于实践者专业资质的把握并不完全遵循文本规定;同时,本土实践缺场的专业教育、应试导向的职业资格考试也无法保证实践者具备灵活实践的专业服务能力。上述两种情形导致专业规范的失效,进一步形塑了弱情境实践者,其在面临多方交代与繁杂的服务过程中主动选择了专业妥协策略,即主动将专业要求和理论知识搁置起来,以完成项目指标为主要任务。

1. 理想与现实的失衡:失效的专业规范标准

K 市从采购指引层面对承接项目的机构、团队资质做出了具体规定,并通过评估平台的前置评估流程对项目服务团队的条件进行把控。从机构层面看,采购指引对机构性质、服务领域、成员资质构成、年检结论以及机构等级等几个核心条件作出了要求。同时,在团队项目主管层面,采购指引要求配备

的项目主管需具备以下条件:本科以上学历,社会工作相关专业或者中级及以上社会工作师,1年以上项目管理经验(15万元以上项目经费额度),1年以上困境儿童社会工作服务经验,项目主管必须驻点。此外,从项目社工层面,采购指引要求大专以上社会工作相关专业毕业,或者持有助理以上社工师证书,拥有困境儿童社会工作服务经验1年以上。^④这些规定的初衷是希望从相对较好的条件中遴选承接机构和项目团队,旨在发挥专业优势更好地为服务对象赋能,然而,保证专业教育背景出身,或者具备职业资质及相关服务经验等要求在现实情境中往往难以满足,诸多现实情境因素形塑了情境中的弱实践者。

其一,接受专业教育的实践者不一定具备相应的实践能力。在教育先行的发展路径之下,我国社会工作专业教育核心内容主要为西方理论和经验,而缺乏本土知识生产与经验模式对教育的反哺,西方专业知识体系缺乏与本土情境经验的有效联结。从理论教学内容来看,正式访谈的14名受访者中仅有2名受访者表示有专门的社会工作理论课程,其余受访者表示,上学期间所学的理论主要散见于《社会工作概论》等基础课程中。现有理论教学内容呈现以下几个特点:第一,未形成系统性内容;第二,以西方社会工作理论的简化版介绍为主,缺乏理论产生的特定情境和脉络梳理,缺少对中西历史、文化、政治脉络差异的分析;第三,主要为基础性知识传递,缺乏对理论本土适应性的反思。而在理论学习方式层面,大部分实践者表示,主要以老师单向讲解和灌输式教育为主,较少有理论与真实实践相互联系的体验感和运用机会。而专业实习在复杂的工具主义实践、教育体制形式化管理中往往流于形式,实习生以及毕业后的实践者到实践场域中主要作为“专业工具”的使用者,即成为书写专业格式表单的工具人。质言之,专业教育培养的、具备社会工作学位的人才并不一定具有相应的专业实践能力。^⑤在西方专业话语及知识等级化的双重压制之下开展的专业教育与实践存在明显的区隔,经由专业教育培养出的大多是拿着西方理论名称与基础概念的“不熟练的实践者”。实践者的弱专业能力在实践场域中进一步延伸,并在知识阻隔与权威依从下被延续,导致

“不熟练的实践者”不断再生产。

学校里面没有把理论结合实践给我们讲透,我们对这个理论的理解还不够透彻,所以没办法把它们(理论)跟实践结合起来运用。虽然是所谓的科班人员,但是在面对具体的工作时依然存在很多困难。(TSYL社工机构项目主管 HSY20230416)

其二,取得相应职业资格证书并具有相关服务经验的实践者也不一定具备相应专业实践能力。一项基于2009—2019年全国社会工作职业资格考试真题的有效性研究发现,现行的助理社工师考试试题偏离了民政部原先设定的“能力为本”导向,更加注重社会工作基础理论知识。^⑥此外,中国社会工作的“证照化”过程是一个政府主导的转型过程,在这一逻辑下,社会工作者更多想要获得国家新的社会工作体系认可,而缺乏对于专业社会工作的价值体认。^⑦因而,从考试性质看,社会工作职业资格考试更偏向一种应试过程;从考试内容看,仍然以西方知识体系为主,本土情境实践能力考察较少;从推动过程来看,其主要遵循行政体认逻辑,缺乏专业社会工作价值体认。由是观之,取得相应职业资格证书的实践者并不一定具备相应的专业实践能力。

2. 专业妥协:弱势情境下实践者的平衡策略

失效的专业规范标准形塑了实践情境中的弱实践者,其在时间精力有限的情况下选择成效交代为主、专业交代为辅的工具理性策略。按照项目契约完成项目指标,达致购买方期待的成效是项目实施中对公共财政必须做出的交代。因而,优先考虑项目的服务量、项目服务目标、采购方期待的服务成效成为项目团队的行动策略,在这一行动策略之下专业交代则被置于次要位置。有受访项目主管表示,实践者按照项目指标要求完成是第一要务:

面对我们的购买方,我们要拿得出服务成效,要去写到这些东西(成效报告、品牌建设情况等)。作为服务提供的实践者而言,其实没有必要非得考虑那么全面,社工只要完成项目的目标或指标,围绕这些要求展开的那些点都在就可以了。(ZY社工机构项目主管 SYT20230330)

尽管理论在实践中会被碎片化、概念化抓取与运用,但仍然作为一种书写工具存在。当面对专业

规范下的档案文书要求时,实践者在弱专业实践情境中便采取实践为先、先交为要的行动策略。从档案文书来看,理论模式板块则呈现出模板化特征,即从“常用理论 20/30/100 种”工具文档或百度词条粘贴复制的模板内容。

很多时候要写项目材料,要交资料上去,当时就觉得这个理论适合这个项目,就先写上去再说。要是我自己,如果当时急的话,我肯定就拿一个大框架套在里面,很少会考虑后面具体合不合适以及用不用它(理论)。(TS 社工机构项目主管 GQL20230419)

因此,虽然实践者对于理论与实践联结有一种理想上的认知状态,但在现实情境中却采取了“退让”策略。这种“退让”是将社会工作作为跳板职业的实践者在面对多方要求与现实弱专业实践情境时的一种主动撤退策略,虽然他们清楚更好的服务需要基于反复探索,以及对于理论的反思性运用,但面对复杂现实情境时却选择一种主动权衡与妥协的策略。

我们也想把上学时所学的理论完美地运用到实务工作当中去,但因为做实务工作事情太多了,不仅仅要做服务,还有其他大量隐性的工作,所以我们没有那么多精力,也没有那么多时间去反复琢磨什么理论合适,以及如何从实践中进行反思。可能大家多是处于一个妥协式的选择性放弃状态。(S 评估中心精康评估项目主管 WXD20230923)

综上所述,实践者基于自身所处的弱专业实践情境,需要权衡多方要求,在现实“不能”与主观“不愿”下主动选择了淡化理论运用,甚至将理论高高悬置的专业妥协策略。这种专业妥协策略不仅是现实服务情境下的一种工具性后退,也是一种对现有未经本土实践情境检验与调整的西方移植知识的主动抛弃。这种情形让社会工作流于一般性事务工作,在无法突显其独特性与不可替代性的背景下容易被其他力量替代。

五、结论与讨论

(一) 研究结论

作为社会治理的重要力量,社会工作被希冀在治理场域中充分发挥专业效能,然而,在专业规范的要求下却出现理论悬浮于实践的反常现象。现有的许多讨论忽略了来自西方情境下的专业规范与本土

治理情境的适应性及其张力机制,因而不能完全解释我国社会工作实践中的理论悬浮现象。研究发现,我国社会工作的发展处于一种过渡性治理体制中,当兼具政治交代意涵与专业引导意涵的西方专业规范进入本土“过渡治理情境”时,其政治交代意涵进一步强化,而专业发展意涵减弱,导致社会工作理论成为一种专业形式自证的文本工具。在这种过渡性治理体制下,社会工作在嵌入过程遭遇了价值观念冲突、服务空间错位和制度调整滞后的三大困境。^④同时,遵循实证主义传统的西方专业化社会工作坚持“自上而下”的服务逻辑,因其抽离于服务对象日常生活,难以完全适用于坚持“自下而上”深入服务对象日常生活的本土情境,导致实践者弱化了对实践的理论想象和本土理论建构,选择了“实践为先”的行动策略。最后,本土实践缺场的专业教育与以知识考察为主的职业考试难以保证实践者具备有效的专业行动能力,加上社会工作者群体的身份处境限制,导致他们在面对专业弱势处境时选择了主动遗弃策略,将理想的专业理论搁置而安于现实。在这三种机制中,对西方社会工作专业规范的遵循是造成实践中出现理论悬浮的客观原因,现有理论难以适用中国文化情境下的生活实践是理论悬浮的根本原因,而实践者对于理论的主动遗弃则是造成理论悬浮的主观原因。

质言之,理论在实践中被工具化、形式化运用的悬浮现象是被以西方知识体系为核心的专业规范与本土治理情境的张力形塑而成的,是在以西方知识移植为中心而忽略本土治理情境的专业化过程中社会工作主体性缺失而导致的后果。也即,之所以出现理论与实践“两张皮”现象,是由于本土实践中追求西方科学专业规范而忽略自身主体性的必然后果。当主体性阙如的专业规范进入本土实践治理情境时只会成为一种零散的“专业展演”工具,难以促进服务对象有效改变和专业健康持续发展。

基于本土实践促进理论与实践的有机融合与发展、推动立足于广大民众日常生活实践经验和历史遗产而形成的理论,是突破理论悬浮于实践困局的关键路径。这种融合指的是调和反思性思维与有目的的行动之间差距的过程,以及增强将理论付诸实

践的能力。^⑤这一方面需要我们立足本土实践建构恰切的专业规范,以本土实践需求定义专业叙事,形成具有中国社会工作主体性的本土性专业规范和知识体系;另一方面,需要我们从现有专业教育与继续教育入手,面向实践需求促进本土知识体系的有效培训与传递,搭建理论与实务有效联结的桥梁,在真实复杂的实践情境中促进专业实践、推动知识生产,形成寓理论于实践中以及实践反哺理论的社会工作发展有效模式。概而言之,未来我国社会工作的发展需要直面我们自己所处的现实情境,直面“我们自己的社会、文化、心理与行为,并重新进行思考和分析”,^⑥坚持社会工作的实践自觉是摆脱西方知识困境的有效处方,^⑦形成关于中国社会工作的独特定义、标识性概念和理论体系,寻求关切人民发展与治理需要的发展逻辑。同时,推进社会工作者进行知识生产,并促进这些知识形态从个体化向社会化转变,是促成实践与理论融合的重要途径。^⑧

值得一提的是,2023年《中央和国家机构改革方案》作出成立中央社会工作部的重大战略部署之后,社会工作与党建引领社会治理的深度融合将是当前及未来社会工作界面对的重要情境和核心议题。这一过程需要学界、实践界和政府的通力合作,深入中国实践场域,推动中国社会工作的文化自觉、理论自觉、实践自觉和专业自觉,不断探索和建构中国特色社会工作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促进中国社会工作自主知识体系的生产,以谋求社会工作高质量发展对于中国乃至全球治理的时代使命。

(二)未尽的讨论

尽管本研究对社会工作理论在实践中的悬浮机制进行了许多学理上的分析,但依然存在一些未尽的议题亟待讨论。

第一,方法论反思。本研究仅对东部发达县域K市困境儿童社会工作实践中出现的理论悬浮于实践的机制进行探讨,并未以全国范围内的社会工作理论悬浮机制和适用性问题作为关切点,因为不同地区和不同领域社会工作实践存在差异,必然影响着理论运用程度的差异,这些方面需要更多学者与一线工作者持续深耕实践场域,进行更深刻、更广泛的合作研究加以回答。

第二,理论反思。本研究所指出的西方社会工作专业规范与本土治理情境存在张力导致理论悬浮于实践的论述,并非否定西方社会工作理论本身的价值,也并不是拒绝中国社会工作形成专业规范,而是强调社会工作从西方起源、发展和成熟过程中形成的专业规范被不假思索地运用,在此过程中既忽略了中国本土情境的现实特性,也弱化了社会工作应有的中国性和主体性。因此,西方专业规范与中国情境之间的张力,是一个具有时空特性的二重概念,中国社会工作在尚未发展成熟的背景下对西方社会工作专业知识与理论形成强有力的依附,从而导致后者成为一种不证自明的专业规范,在某种程度上被塑造为不可逾越的专业权力。这种专业规范或专业权力较少会考量欠发达国家或地区的社会文化主体性,导致这种专业移植和理论运用处于一种不平等的关系张力之中。这就需要逐渐从中西不平等的知识移植—传播中“解放”出来,真正形成体现中国情境、具有中国自身主体性的社会工作知识体系和理论体系。对于这样的目标愿景,已有部分学者在开始探索和追寻,驱动着我们进一步思考和探索理论发挥作用的条件和机制。

第三,内容反思。本研究讨论社会工作理论在实践中的悬浮,并不是指所有社会工作理论都存在悬浮,也并不是要谈所有社会工作实践领域中的理论悬浮。本文仅以困境儿童社会工作实践中的理论悬浮为对象,试图阐释导致理论在实践中出现悬浮的深层机理。而对于广泛意义上的社会工作理论悬浮背后的生成机理,则需要针对不同领域社会工作理论的应用情况和实践状况进行评价和研究,形成一个具有普遍性、整合性意义上的解释框架。本文的探索拉开了深度探究社会工作理论在实践中的运用效果、恰适性以及悬浮现象生成机理的序幕,也是一次从实践角度反思和理解中国社会工作本土化的积极尝试,未来需要更多研究者和实践者加入其中。

注释:

①徐选国、秦莲:《制度赋能与专业建构: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社会工作发展的双重动力》,《学习与实践》2023年第5期。

②李迎生:《构建本土化的社会工作理论及其路径》,《社会科学》2008年第5期;何雪松:《重构社会工作的知识框架:本土思想资源的可能贡献》,《社会科学》2009年第7期。

③焦若水、高怀阳:《镶套、内卷与自证:社会工作者书写的三重动力机制》,《社会建设》2023年第3期;文军、何威:《从“反理论”到理论自觉:重构社会工作理论与实践的关系》,《社会科学》2014年第7期;雷杰、黄婉怡:《实用专业主义:广州市家庭综合服务中心社会工作者“专业能力”的界定及其逻辑》,《社会》2017年第1期;吴越菲:《社会工作“去专业化”:专业化进程中的理论张力与实践反叛》,《河北学刊》2018年第4期;史天琪:《悬浮的技术:社区工作者的专业实践困境及其生成机制》,《社会工作》2023年第2期;葛道顺:《社会工作转向:结构需求与国家策略》,《社会发展研究》2015年第4期;卫小将:《社会工作理论的“三重性”及爱的实践艺术》,《社会科学》2020年第6期。

④马凤芝:《中国式现代化新发展阶段社会工作的任务与挑战》,《社会工作》2023年第6期。

⑤Chamberlain, E., "Charting a Course: Hazards for the Academic", *Contemporary Social Work Education*, No.1, 1977, p.6; Barbra, T., "Social Work Research and Its Relevance to Practice: The Gap between Research and Practice Continues to Be Wide", *Journal of Social Service Research*, No.5, 2017, pp.547-565.

⑥Jennie, P., "The Integration of Theory and Practice: A Re-examination of a Paradoxical Expectation", *The British Journal of Social Work*, No.1, 1986, pp.79-96.

⑦K市“点亮希望,伴你成长”困境儿童社会工作服务项目是2020年政府购买社会工作服务试点项目,于2021年在全市12个区镇全面铺开。遵循学术惯例,文中出现的地名、人名均作了化名处理。

⑧Brian, S., "Theory and Practice in Social Work: A Re-examination of a Tenuous Relationship", *The British Journal of Social Work*, Vol.8, No.1, 1978, pp.1-22.

⑨Verner, D., Mikael, S., "Bridge over Troubled Water-Closing the Research-Practice Gap in Social Work", *The British Journal of Social Work*, Vol.51, No.7, 2021, pp.2722-2739.

⑩Brian, S., "Theory and Practice in Social Work: A Re-examination of a Tenuous Relationship", *The British Journal of Social Work*, Vol.8, No.1, 1978, pp.1-22.

⑪舍恩:《反映的实践者:专业工作者如何在行动中思考》,夏林清译,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07年,第11-15页。

⑫Barbra, T., "Social Work Research and Its Relevance to Practice: The Gap between Research and Practice Continues to

Be Wide", *Journal of Social Service Research*, Vol.43, No.5, 2017, pp.547-565.

⑬文军、何威:《从“反理论”到理论自觉:重构社会工作理论与实践的关系》,《社会科学》2014年第7期。

⑭侯利文:《被忽略的实践智慧:迈向社会工作实践研究的新方法论》,《社会科学》2018年第6期。

⑮何雪松:《社会工作理论》,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18页。

⑯Al-Maseb, H., Alkhurinej, A., Alduwaihi, M., "The Gap between Theory and Practice in Social Work", *International Social Work*, Vol.58, No.6, 2015, pp.819-830; Allen Rubin, "Efforts to Bridge the Gap between Research and Practice in Social Work", *Research on Social Work Practice*, Vol.25, No.4, 2015, pp.408-414.

⑰徐选国、田雪珍、孙洁开:《从外部移植迈向本土自觉:中国社会工作发展的理论逻辑》,《学习与实践》2021年第10期。

⑱王思斌:《试论我国社会工作的本土化》,《浙江学刊》2001年第2期;王思斌:《中国式现代化新进程与社会工作的新本土化》,《社会工作》2023年第1期。

⑲徐选国:《新时代中国社会工作发展的逻辑转换与自主知识体系建构》,《学海》2023年第1期。

⑳K市民政局:《关于印发〈K市困境儿童社会工作服务项目采购指引(K民[2021]67号)〉的通知》,内部文件。

㉑资料来源于项目内部工作资料:《困境儿童及家庭社会工作全套服务格式表单》(20210415定稿版)。

㉒雷杰、易雪娇、张忠民:《行政化导向的新管理主义:乡镇(街道)社会工作站建设与政府购买社会工作服务——以湖南省“禾计划”A市项目为例》,《社会工作与管理》2022年第4期。

㉓王思斌:《中国社会的求一助关系——制度与文化的视角》,《社会学研究》2001年第4期。

㉔由于社会工作理论层次较为丰富,本文主要聚焦于实践过程,关注与社会工作服务实践直接相关的理论,即关于社会工作者如何理解、运用以及促进实践改变的实务理论,包含社会工作常用理论模式、方法技巧等。

㉕焦若水、高怀阳:《镶套、内卷与自证:社会工作者书写的三重动力机制》,《社会建设》2023年第3期。

㉖雷杰、黄婉怡:《实用专业主义:广州市家庭综合服务中心社会工作者“专业能力”的界定及其逻辑》,《社会》2017年第1期。

㉗何国良:《实践研究与论理逻辑》,《社会工作与管理》

2023年第1期。

⑳2023年5月26日,在K市困境儿童社会工作服务项目督导平台启动会议上的实地观察。

㉑K市实地访谈:ZY社工机构项目社工SY20230612;JSYL社工机构项目主管HSY20230416;LR公益发展中心项目主管ZQ20230523。

㉒2023年5月26日于K市困境儿童社会工作服务项目督导平台启动会议中社工实习生M的小组讨论发言。

㉓舍恩:《培养反映的实践者:专业领域中关于教与学的一项全新设计》,郝彩虹、张玉荣等译,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08年,第3-18页。

㉔K市民政局:《关于印发〈K市困境儿童社会工作服务项目采购指引(K民[2021]67号)〉的通知》,内部文件。

㉕何雪松、刘莉:《政府购买服务与社会工作的标准化——以上海的三个机构为例》,《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2期。

㉖马尔科姆·派恩:《现代社会工作理论》,冯亚丽、叶鹏飞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28页。

㉗黄晓星、熊慧玲:《过渡治理情境下的中国社会服务困境:基于Z市社会工作服务的研究》,《社会》2018年第4期。

㉘童敏:《项目服务的专业逻辑:社会工作专业化的本土路径》,《社会工作》2016年第3期。

㉙Juliette, O., *Understanding and Using Theory in Social Work*, Great Britain: Learning Matters Ltd., 2008, p.75.

㉚2022年9月16日K市实地活动监测非正式访谈。访谈对象:SYT,ZY社工机构项目主管。

㉛资料来源于K市实地调研。访谈对象:ZY社工机构项目主管GH20221124;DT社工机构项目主管LM20230529;ZY社工机构项目主管SYT20230330。

㉜资料来源于K市实地调研。访谈对象:TS社工机构高管兼督导WXD20230528;ZY社工机构项目主管GH20221124;TS社工机构项目社工LWL20230419;LR公益发展中心ZQ20230523、TXJ20221021。

㉝ZY社工机构项目主管SYT20230330;LR公益发展中心ZQ20230523。

㉞徐选国、田雪珍、孙洁开:《从外部移植迈向本土自觉:中

国社会工作发展的理论逻辑》,《学习与实践》2021年第10期。

㉟Pierson, J., *Understanding Social Work: History and Context*, Maidenhead: Open University Press, 2011, pp.5-18.

㊱舍恩:《反映的实践者:专业工作者如何在行动中思考》,第21页。

㊲童敏、周焱:《从需求导向到问题导向:社会工作“中国道路”的专业合法性考察》,《社会工作》2019年第4期。

㊳童敏、周晓彤:《场景化问题解决:中国特色社会工作的道路选择与理论建构》,《河北学刊》2023年第3期。

㊴徐选国:《从嵌入系统到嵌入生活:我国社会工作的范式转向与时代选择》,《社会工作与管理》2019年第3期。

㊵王思斌:《中国社会的求一助关系——制度与文化的视角》,《社会学研究》2001年第4期。

㊶K市实地调研,访谈对象:JSYL社工机构项目主管HSY20230416。

㊷参见K市民政局《关于印发〈K市困境儿童社会工作服务项目采购指引(K民[2021]67号)〉的通知》。

㊸李青、王海洋:《培养反映的实践者:社会工作教育的取径转向》,《华东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2年第4期。

㊹曾守锺:《中国助理社会工作师职业水平考试有效性研究——基于2008-2019年国家真题的分析》,《社会工作》2020年第5期。

㊺朱健刚、童秋婷:《反思社会工作的“证照化”》,《中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3期。

㊻陆杰华、黄钰婷:《过渡性治理体制下社会工作嵌入社区的困境与应对策略——基于W市Z街道购买公共服务的质性研究》,《社会政策研究》2023年第4期。

㊼Jennie, P., "The Integration of Theory and Practice: A Re-examination of a Paradoxical Expectation", *The British Journal of Social Work*, No.1, 1986, pp.79-96.

㊽翟学伟:《中国人行动的逻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7年,第6页。

㊾王海洋:《社会工作的实践自觉:理论蕴涵与实现路径》,《学海》2023年第5期。

㊿安秋玲:《社会工作者实践性知识的社会向度探析》,《社会科学》2021年第7期。